

DOI:10.3969/j.issn.1674-8131.2012.02.002

中国城乡收入差距：扩大还是缩小？^{*}

周晓津

(广州市社会科学院 经济研究所, 广州 510410)

摘要:基于产出的资本所得由城镇人口所有的假设和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框架,构建中国城乡人均收入差距模型,分析表明:随着城市化率的提高,城乡人均收入差距倍数会逐渐缩小;经济中资本所得份额越大,城乡人均收入差距倍数就越大;农村劳动力向城镇流动将减少城乡人均收入差距。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框架下,随着劳动力全国范围内的自由流动,无论是理论模型及其推论还是实证检验结果都表明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并非扩大而是逐步缩小。

关键词:城乡收入差距;资本所得;劳动力流动;城市化;剩余劳动力转移;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
中图分类号:F014.4;F124.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131(2012)02-0005-08

China's Urban-rural Income Gap: Growing or Shrinking?

ZHOU Xiao-jin

(Economic Research Institute, Guangzhou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 Guangzhou 510410, China)

Abstract: Under the assumption that urban residents enjoy income from forms of capital return and based on neo-classical economic growth theory framework, this paper constructed the model of per capita income ga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 the analysis shows that, with the rising of urbanization rate, the multiple of urban-rural per capita income gap will gradually shrink, the bigger the share of capital return is, the bigger the multiple of urban-rural per capita income gap is, that the flowing of rural labor from rural to urban area will decrease urban-rural per capita income gap. Under socialism market economy framework, with free nationwide flowing of labors, both theoretical model and its deduction or empirical test results indicate that China's income ga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 is not enlarged but gradually shrinks.

Key words: urban-rural income gap; capital return; labor mobility; urbanization; surplus labor transfer; neoclassic economic growth theory

* 收稿日期:2011-12-28;修回日期:2012-01-29

感谢陈钊教授和2009年第三届“中国青年经济学家联谊会”诸位评论人的建议与评论。

作者简介:周晓津,男,副研究员;经济学博士,在站金融学博士后(融资租赁方向),在广州市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工作,主要从事城市(区域)经济学、现代服务业研究;Tel:13926195552,E-mail:zhxjin@gzass.net。

一、引言

收入不平等已成为当今国际社会最关心的话题之一。其中,中国的收入不平等问题格外引人注目。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究竟有多大?还会扩大到什么程度?不少学者认为,中国城乡居民的人均收入差距存在持续扩大的趋势,中国已从收入比较平等的国家,迅速成为收入不平等程度比较严重的国家(胡鞍钢,2004;陆铭等,2004;吴光炳,2006;郭剑雄等,2006)。经济观察家们认为,在中国的城镇和农村,已同时出现“穷人”阶层,迅速扩大的贫富差距有可能危及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和谐。

国内外有关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结论更多的来自对中国国家统计数据的简单计算后而得出的直观结论,很少考虑到劳动力流动对中国乡村居民收入的影响。事实上,城乡收入差距与劳动力的流动密不可分。Braun(1993)构建的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表明,区域间劳动力流动有利于促进地区经济的收敛。Taylor等(1997)的局部均衡模型发现,劳动力转移是1870—1913年间OECD国家间劳动生产率和实际工资的收敛的最重要因素。而Shioji(2002)的研究发现,劳动力流动会对各地区的人力资本水平产生影响,而且这种影响的确降低了劳动力流动导致的收敛性,但它的程度却很小,远远不能解释关于劳动力流动及地区收敛性在理论和经验研究上的差距。

随着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劳动力流动的规模日渐扩大,许多学者对中国的劳动力迁移问题进行了多方面研究。姚枝仲等(2003)利用Taylor等(1997)的方法,认为区域间劳动力流动除了能使地区间要素收入相等以外,还能削平地区间要素禀赋差异,最终实现地区间人均收入均等。王德等(2003)估计了1985—2000年中国人口流动对地区差距的影响,认为人口流动有助于缩小地区差距。王小鲁等(2004)认为中国的劳动力流动可以缩小地区差距,主要通过两个途径,一是中西部低收入地区的劳动力外流,会缓和这些地区农村人口对土地的压力和就业压力,由于劳动边际报酬递减规律的作用,这些地区的劳动生产率会随劳动力数量的减少而提高,从而提高人均收入水平;二是劳动力流动还为中西部地区带来了大量的汇款。刘传江

等(2005)对中国的劳动力流动与地区差距进行了实证分析,他们将各省1978—2003年经济增长率(人均GDP增长率)对各种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其中采用同时期各省份人口净迁入数量的年均增长率作为劳动力流动的指标,得出人口迁入与地区经济增长有显著关系,并进一步分析认为人口流动有助于缩小地区差距。

林毅夫等(2004)对中国的劳动力流动与地区差距的关系做了一个经验研究,通过估计流动者对地区间收入差距的反映弹性,认为劳动力流动是一种缩小差距的有效途径,但目前的流动规模仍然不足以缩小现存的收入差距。蔡昉(2005)讨论了为什么劳动力流动没有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几个因素,认为由于中国存在重工业优先发展的倾向导致经济增长对就业的促进作用不强,加上农业和农村发展不足以及仍然存在许多劳动力流动的障碍和限制等导致的流动规模不足是使劳动力流动不能缩小城乡差距的主要原因。

关于劳动力流动对地区经济差距的影响,国内存在着两种对立的观点。樊纲(1995)、崔传义等(1999)、庾德昌等(1999)、邓祖善(1999)、蔡昉等(2001,2002)、姚仲枝等(2003)、李国平等(2003)、王德等(2003)、王小鲁等(2004)、林毅夫等(2004)、蔡昉(2005)、刘传江等(2005)认为,劳动力的跨地区流动有助于缩小地区间经济差距。另一种观点则相反:跨地区的劳动力流动扩大了地区差距。刘强(2001)认为,20世纪80年代劳动力在区域内部转移使区域经济出现收敛,但90年代后出现的劳动力跨区域转移却扩大了地区间的经济差距。钟笑寒(2005)认为,地区工资差距在1992年以后仍然是显著扩大的,东部沿海地区的工资增长持续高于中西部地区,劳动力流入的主要行业,如建筑业和制造业,工资的地区差距同样是扩大而非收敛的。谷书堂等(1994)认为,导致空间上两极分化的主要的、直接的原因是人口、社会经济活动在空间上的过度集中。范剑勇(2004)将这种观点向前推进了一步,认为劳动力跨地区流动加剧了东部沿海地区的产业聚集,加速了工业化进程,扩大了地区收入差距。

不少学者还从不同的角度探讨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陆铭等(2004)从城市化、城市倾向的

经济政策角度分析我国的城乡收入差距;刘文忻等(2006)着眼于要素积累与政府政策分析;郭剑雄等(2006)考察了内生增长要素;而张凌云(2006)则从制度性成因进行了讨论。

我们认为,这些研究中有关劳动力流动数量直接引用统计数据,而统计汇报的劳动力流动数据基本上仅为规模企业所雇佣来自农村劳动力的数量,其规模仅为实际规模的三分之一甚至更少。20世纪90年代中国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最主要的原因是进入城镇的农民工在城镇的唯一影响产出的要素只有劳动力,而劳动力所占整个产出的比例在我国是非常低的,基本上不到30%,这就意味着即使达到要素价格均等的状态,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至少会维持在3倍甚至更多。

本文将在产出中资本所得由城镇居民拥有的假设和新古典增长理论框架下构建了中国城乡人均收入差距模型,分析影响城乡人均收入差距扩大缩小的主要因素和改革开放以来的动态变化,并与统计机构公布的城乡人均收入的相关指标进行对比,以期能更准确地刻画对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及其动态变化。

二、中国城乡收入差距模型

本节在三个基本假设的基础上构建中国城乡收入差距模型,讨论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因素以及城乡人均收入差距的变动趋势。

1. 基本假设

假设一:整个经济分为农业和非农业两个部门,乡村为农业部门,非农业部门在城镇。

假设二:农业部门的产出全部分配给乡村人口。有两种意见值得考虑:一是有文献表明,中国农村消费相当一部分(40%或以上)为农民自己生产而非由市场配置(王宏伟,2000;夏英,2002,许世卫,2002;李实,2003;李实等,2007)。二是农村产出在通过城镇消费而实现的价值增值的绝大部分并非由农村人口所得而是流入城镇居民。按粮食、蔬菜、水果、肉类等产品的收购价格来计算农村人口收入存在统计数据的缺失和实际操作上的困难,考虑到两种因素可以互相抵消以及计算上的简便,在下面的两部门模型中,我们假设农业部门的产出全部归农村人口所有。

假设三:非农业部门产出在资本和劳动力之间进行分配,资本所得全部分配给城镇人口,劳动力所得按劳动人口的比例分配给农村和城镇。事实上,我国农村人口从城镇获取收入的唯一途径是向城镇提供非农业劳动力,虽然微薄的农村居民存款可以获得利息收入,但这种收入甚至难以抵消由于通货膨胀而带来的实际损失。资本所得全部归城镇居民的主要表现形式有:(1)城镇基础设施,如交通、能源、市政、公园、休闲场所和住房保障,其中很多面向市民低价甚至是免费提供;(2)城镇医疗、养老、工伤、失业等保险;(3)教育,无论是教学硬件设施或者人员投入,农村无法和城镇相比,农民工子女进入城镇开办的公立学校更是难上加难。在考察城乡收入差距的时候,还没有文献把资本所得视为全部归城镇居民所有,本文尚属首次。这些面向城镇居民的专业化服务和保障体系,大大节约了城镇居民的时间成本,从而使城镇居民拥有比农村居民更多的闲暇或工作时间,其工作质量和效率远高于农村。不可否认,城镇中越来越多的企业家来自农村,但这部分人取得成功后非常容易获得城镇户口。

2. 收入差距倍数模型 I :两部门(农业部门和非农业部门)模型

在本模型中,假设农业产出份额全部归乡村所有。设农业产出占整个经济产出的比例为 δ ,经济总产出为 Y 。非农业产出为 $C-D$ 生产函数,生产要素为资本 K 和劳动力 L 。产出中资本所得的比例为 α 。乡村还提供一部分劳动力进入城镇就业,城镇产出全部为非农业产出,其生产函数为:

$$F_{city} = AF(K, L) = AK^\alpha L^{1-\alpha} = (1-\delta)Y \quad (1)$$

非农业产出中乡村劳动力所得只有劳动力份额,而资本份额全部为城镇人口所得,除此之外,城镇总收入还包含城镇劳动力的劳动力份额。设城市化率为 γ ,非农业劳动力中来自乡村的劳动力所占比例为 θ ,则乡村总收入:

$$\begin{aligned} Y_A &= \delta Y + (1-\alpha)\theta(1-\delta)Y \\ &= [\delta + \theta(1-\alpha)(1-\delta)]Y \end{aligned} \quad (2)$$

城镇总收入:

$$\begin{aligned} Y_C &= \alpha(1-\delta)Y + (1-\alpha)(1-\theta)(1-\delta)Y \\ &= [\alpha + (1-\alpha)(1-\theta)](1-\delta)Y \end{aligned}$$

$$= [1 - \theta + \alpha\theta](1 - \delta)Y \quad (3)$$

设经济中总人口为 P , 则乡村人口为 $(1 - \gamma)P$, 城镇人口为 $P\gamma$, 则乡村年人均收入:

$$y_A = \frac{[\delta + \theta(1 - \alpha)(1 - \delta)]Y}{(1 - \gamma)P}$$

$$= \frac{\delta + \theta(1 - \alpha)(1 - \delta)}{1 - \gamma} \times \frac{Y}{P} \quad (4)$$

城镇年人均收入:

$$y_C = \frac{[1 - \theta + \alpha\theta](1 - \delta)Y}{\gamma P}$$

$$= \frac{[1 - \theta + \alpha\theta](1 - \delta)}{\gamma} \times \frac{Y}{P} \quad (5)$$

城乡年人均收入倍数, 即城镇年人均收入除以乡村年人均收入:

$$\eta_{CA} = \frac{\frac{[1 - \theta + \alpha\theta](1 - \delta)}{\gamma} \times \frac{Y}{P}}{\frac{\delta + \theta(1 - \alpha)(1 - \delta)}{1 - \gamma} \times \frac{Y}{P}}$$

$$= \frac{[1 - \theta + \alpha\theta](1 - \delta)}{\delta + \theta(1 - \alpha)(1 - \delta)} \times \frac{1 - \gamma}{\gamma} \quad (6)$$

城乡年人均收入倍数随着时间的变动。我们将上式改写成时间(年份 t)的方程式。

$$\eta(t) = \frac{[1 - \theta(t) + \alpha(t)\theta(t)](1 - \delta(t))}{\delta(t) + \theta(t)(1 - \alpha(t))(1 - \delta(t))} \times \frac{1 - \gamma(t)}{\gamma(t)} \quad (7)$$

3. 收入差距倍数模型 II: 全国统一大市场模型

在本模型中, (1) 乡村人口的收入完全依靠其所提供劳动力的多少, 没有资本所得; (2) 资本所得全部归城镇人口所有, 而且城镇人口还得到经济总产出中部分劳动收入所得, 其生产函数为:

$$Y = AF(K, L) = AK^\alpha L^{1-\alpha} \quad (8)$$

经济中的劳动力来自乡村的劳动力所占比例为 ρ , 则乡村总收入:

$$Y_A = (1 - \alpha)\rho Y \quad (9)$$

城镇总收入:

$$Y_C = \alpha Y + (1 - \alpha)(1 - \rho)Y$$

$$= [1 - (1 - \alpha)\rho]Y$$

$$= [1 - \rho + \alpha\rho]Y \quad (10)$$

设经济中总人口为 P , 则乡村人口为 $(1 - \gamma)P$, 城镇人口为 $P\gamma$, 则乡村年人均收入:

$$Y_A = \frac{[(1 - \alpha)\rho]Y}{(1 - \gamma)P}$$

$$= \frac{\rho(1 - \alpha)}{1 - \gamma} \times \frac{Y}{P} \quad (11)$$

城镇年人均收入:

$$Y_C = \frac{[1 - \rho + \alpha\rho]Y}{\gamma P}$$

$$= \frac{[1 - \rho + \alpha\rho]}{\gamma} \times \frac{Y}{P} \quad (12)$$

城乡年人均收入倍数, 即城镇年人均收入除以乡村年人均收入:

$$\eta_{CA} = \frac{\frac{[1 - \rho + \alpha\rho]}{\gamma} \times \frac{Y}{P}}{\frac{\rho(1 - \alpha)}{1 - \gamma} \times \frac{Y}{P}}$$

$$= \frac{1 - \rho + \alpha\rho}{\rho(1 - \alpha)} \times \frac{1 - \gamma}{\gamma} \quad (13)$$

城乡年人均收入倍数随着时间的变动。我们将上式改写成时间(年份 t)的方程式。

$$\eta(t) = \frac{[1 - \rho(t) + \alpha(t)\rho(t)]}{\rho(t)(1 - \alpha(t))} \times \frac{1 - \gamma(t)}{\gamma(t)} \quad (14)$$

4. 城市化率(γ)对城乡收入差距倍数的影响

在新古典增长模型下, 城乡人均收入差距主要受资本对产出的贡献以及城市化率的影响。很明显, 当人口高度城市化之后, 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虽然在绝对值方面依然存在, 但城乡个人效用应当相等。此时, 人们将更多地关注城镇不同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在城乡严重分割的二元制度安排下, 中国城乡人均收入差距主要受庞大的农业人口和相对低的农业产值的影响。这种影响受以重工业化为国家主要发展方向的人为制约。在 20 世纪 80 年代的改革初期, 中国农业总产出占整个经济的 30%, 而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 80% 左右, 城乡人均收入差距大体上为 9:1。在均衡点时, 我们考察城市化率对城乡收入差距倍数的动态影响。

模型 I:

$$\frac{\partial \eta}{\partial \gamma} = \left(\frac{[1 - \theta + \alpha\theta](1 - \delta)}{\delta + \theta(1 - \alpha)(1 - \delta)} \times \frac{1 - \gamma}{\gamma} \right)'$$

$$= - \frac{[1 - \theta + \alpha\theta]}{\frac{\delta}{1 - \delta} + \theta(1 - \alpha)} \times \frac{1}{\gamma^2} < 0 \quad (15)$$

模型 II:

$$\begin{aligned}\frac{\partial \eta}{\partial \gamma} &= \left(\frac{1 - \rho + \alpha \rho}{\rho(1 - \alpha)} \times \frac{1 - \gamma}{\gamma} \right), \\ &= - \left[\frac{1 - \rho + \alpha \rho}{\rho(1 - \alpha)} \right] \times \frac{1}{\gamma^2} < 0\end{aligned}\quad (16)$$

在模型 II 中所计算的城乡人均收入差距倍数,其中隐含的假设是劳动力流动的调整速度是非常快的,即城乡就业很快能够达到均衡,农民在城镇和农村就业的收入所得相等,都为劳动所得。

显然,无论在模型 I 还是在模型 II 中,随着城市化率的增加,城乡人均收入差距倍数会逐渐缩小。因此,加速城市化进程,将有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5. 劳资产出分配(α)对城乡收入差距倍数的影响

虽然资本要素在整个产出中所占比例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似乎变动不大,但我们注意到中国与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在劳动收入所占比例上明显不同。我们认为这种不同的主要原因是产业结构的差异。发达国家产出主要来自于第三产业,而第三产业基本上是以服务业为主,服务业中劳动工资占了相当大的比例。我们发现,服务业在总产出中所占的比例大致与劳动要素在总产出中所占的比例相近。下面考察资本所得 α 变动下的模型动态:

模型 I:

$$\begin{aligned}\frac{\partial \eta}{\partial \alpha} &= \left(\frac{[1 - \theta + \alpha \theta](1 - \delta)}{\delta + \theta(1 - \alpha)(1 - \delta)} \times \frac{1 - \gamma}{\gamma} \right), \\ &= \frac{\theta(1 - \delta)}{[\delta + \theta(1 - \alpha)(1 - \delta)]^2} \times \\ &\quad \frac{1 - \gamma}{\gamma} > 0\end{aligned}\quad (17)$$

如果劳动要素在收入分配中能够占有很高的比例,则由于大量农村劳动力流入城镇,城乡人均收入差距将迅速缩小。目前,中国人均收入差距主要来源于财产性收入,劳动收入所占的比例相当低,甚至不到 20%。从博弈角度来看,在农村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的情况下,城镇企业将产出中分配给农民工的数量大致与农民工在农村取得的收入一样,这也是一种均衡。在模型 I 中,资本所得对城乡年人均收入差距倍数的影响为正,即 α 取值越大,城乡年人均收入差距就会越大。

模型 II:

$$\begin{aligned}\frac{\partial \eta}{\partial \alpha} &= \left(\frac{1 - \rho + \alpha \rho}{\rho(1 - \alpha)} \times \frac{1 - \gamma}{\gamma} \right) \\ &= \frac{1}{\rho(1 - \alpha)^2} \times \frac{1 - \gamma}{\gamma} > 0\end{aligned}\quad (18)$$

综上所述,经济中资本所得份额越大,城乡年人均收入差距倍数就越大。

6. 农业产出份额(δ)对城乡收入差距倍数的影响

虽然农业产出的实现在很大程度上需要通过城镇市场的交易,但我们认为将农业产出所得的收入归入农村收入是恰当的。有关研究表明,中国农村大约有 40% 的农产品是由农民自己供给的,这也意味着至少有 40% 的农业产出并没有按市场价格计算在农村的总收入内。

从模型 I 来看,经济转型初期,农业产出占经济总产出的份额较大,城乡年人均收入差距较小,而经济转型过程也是农业产出占总产出比例不断缩小的过程,因而城乡年人均收入差距会持续扩大。这与我国在 20 世纪 90 年代城乡差距扩大而到了本世纪城乡差距缩小是相吻合的。因为进入 21 世纪,中国农业占总产出的比例基本上维持在较为固定的比例上,即农业占总产出份额的变化因素对城乡收入差距倍数的影响基本稳定。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形下,农业产出占总产出比例减小,城乡年人均收入差距也会缩小,这就意味着加大对农村投入,或者靠提升农产品的价格,城乡年人均收入差距反而会扩大。

模型 I:

$$\begin{aligned}\frac{\partial \eta}{\partial \delta} &= \left(\frac{[1 - \theta + \alpha \theta](1 - \delta)}{\delta + \theta(1 - \alpha)(1 - \delta)} \times \frac{1 - \gamma}{\gamma} \right), \\ &= - \frac{[1 - \theta + \alpha \theta]}{[\frac{\delta}{1 - \delta} + \theta(1 - \alpha)]^2} \times \frac{1}{(1 - \delta)^2} \times \\ &\quad \frac{1 - \gamma}{\gamma} < 0\end{aligned}\quad (19)$$

7. 城镇外来劳动力(θ)对城乡收入差距倍数的影响

我们只考虑模型 I 中的城镇外来劳动力的问题。虽然从官方的数据来看,中国农村依旧还有相当多的剩余劳动力,但官方公布的农村外出劳动力基本上是常年性外出的劳动力,实证文献和估算研

究(周晓津,2008)表明这种通过城镇调查而得出的农村常年性外出的农村劳动力只占实际外出总劳动力的一半。在经历近30年的高速增长和成功的经济改革之后,坚持认为中国农村仍然有高比例、大规模的剩余劳动力的观点,已经成为缺乏经验证据的教条,且妨碍我们对劳动力市场形势做出正确的判断(蔡昉,2007)。从总人口看,今天农村的实际人口只有总人口的百分之三十五左右;而从劳动人口看,操作农业的大约是百分之二十。一位作过比较深入调查的专家朋友说只剩百分之十五左右(张五常,2007)。

姚枝仲等(2003)证明了在一定的假设条件下,地区间劳动力自由流动能拉平地区差距,实现地区间人均收入均等。但实证研究文献和官方统计资料却显示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城乡人均收入差距迅速扩大,姚枝仲等给出的解释是认为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并没有形成规模,而我们的研究却表明中国农村外出劳动力的规模是非常巨大的。仅广东省在2004年就吸引跨省外来劳动力4000多万人,约占全国农村劳动力的10%。我们考察模型I中的城镇外来劳动力占整个经济中非农劳动力比例的动态变化。

模型 I :

$$\begin{aligned} \frac{\partial \eta}{\partial \theta} &= \left(\frac{[1 - \theta + \alpha \theta](1 - \delta)}{\delta + \theta(1 - \alpha)(1 - \delta)} \times \frac{1 - \gamma}{\gamma} \right), \\ &= \frac{(2\delta - 1)(1 - \alpha)}{[\delta + \theta(1 - \alpha)(1 - \delta)]^2(1 - \delta)} \times \\ &\quad \frac{1 - \gamma}{\gamma} \end{aligned} \quad (20)$$

如果 $\delta \in (0.5, 1]$, 则 $\frac{\partial \eta}{\partial \theta} > 0$, 即在一个以农业为主导的经济体中, 农业产值占经济总产值的50%以上, 流入城镇的劳动力增加将使城乡年人均收入差距扩大。由于我们讨论的是1978年以后的中国经济转型时期, 而此期间中国农业产出基本上只占到总产出的40%以下, 即 $\delta \in (0, 0.5)$ 的情形, 此时 $\frac{\partial \eta}{\partial \theta} < 0$, 农村劳动力向城镇流动将减少城乡年人均收入差距。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形下, 农村劳动力流向城市, 其在非农业劳动力中所占的份额的增加在初期确实可以缩小城乡年人均收入差距, 但随着比例的增长, 其影响逐步缩小。

三、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实证研究

根据前述模型, 我们利用政府提供的转移劳动总数、剩余劳动力转移估计数据以及模型参数的变化, 给出1985—2004年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倍数如图1所示。在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条件下(模型II), 无论用哪种类型的数据, 三者的变动趋势是一致的: 由劳动力转移总数的政府统计数据所得出的城乡收入差距倍数(模型II)连线居中; 基于流动劳动力规模估计数据得到的城乡收入差距倍数估计数(模型II)连线位于最下方; 模型II中参数 α 变动后的城乡收入差距倍数连线位于最上方。从图中可以看出, 20世纪80年代中国城乡收入差距迅速缩小, 而90年代持续扩大; 1998年至今逐步缩小, 但速度减缓。

不少文献利用年度统计数据分别计算出城镇和乡村的人均收入, 发现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城乡人均收入持续扩大。本模型同样能够给出比较满意的解释。到了20世纪90年代, 中国劳动力供给始终处于供过于求的状态。农村改革释放出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 加上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的城镇改革, 城镇经济中的隐性失业转化为显性失业。过量的劳动力供给导致中国城镇十余年名义工资基本保持不变而实质工资持续下降, 即资本所得份额上升而同期劳动所得份额下降。资本份额 α 从1990年的0.70增加到1997年的0.75, 总产出中劳动力所得由1990年的0.30下降到0.25。

图2利用前述模型I模拟由于资本所得份额的变动而导致城乡人均收入差距的变化。可以看出, 模型所估计的城乡收入差距和利用统计数据所计算的城乡收入差距的趋势是完全一致的。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 虽然城市化率上升及农业产出占总产出比例的下降会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但由于资本所得份额上升导致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在本文的模型中, 农业占总产出比例的提高非但不能缩小城乡人均收入差距, 反而扩大差距, 这似乎与人们通常的经验相反。本文认为这主要是由于农业产出比例的提高需要更多的农村劳动力从事农业劳动, 而农业部门和非农业部门的边际生产效率是不同的, 即非农业部门的边际生产率大于农业部门的边际生产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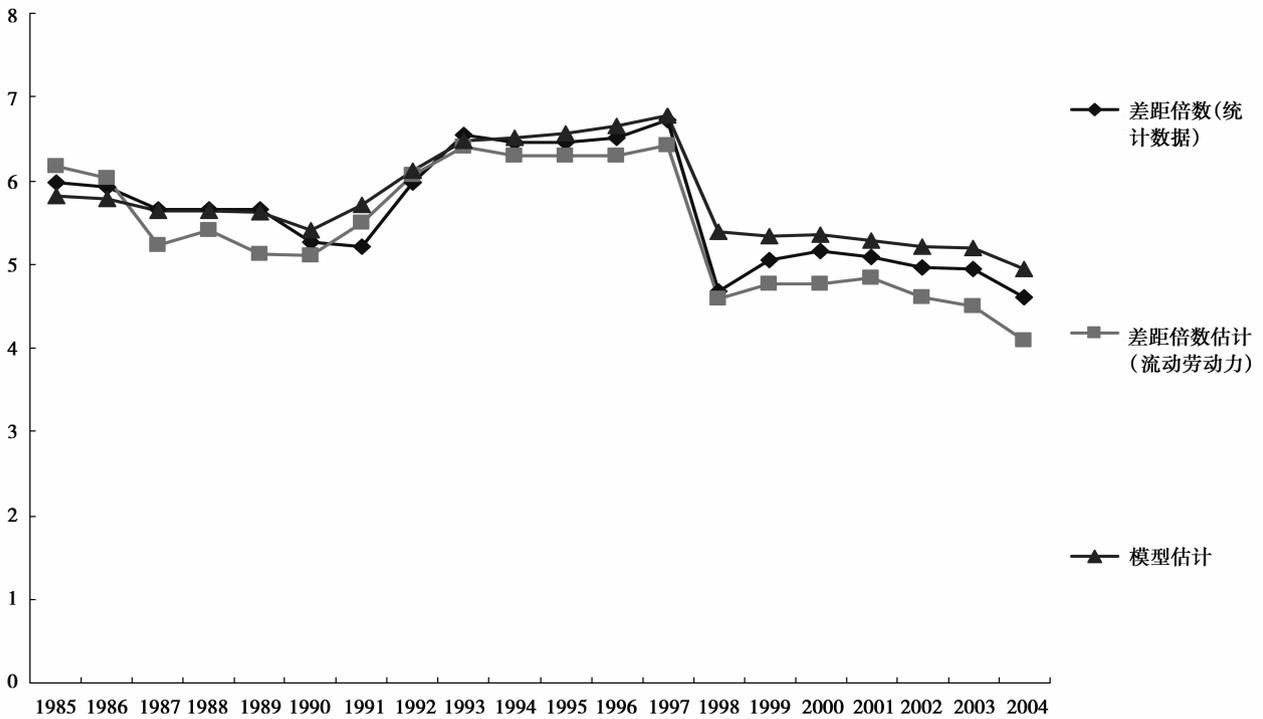


图1 中国城乡人均收入差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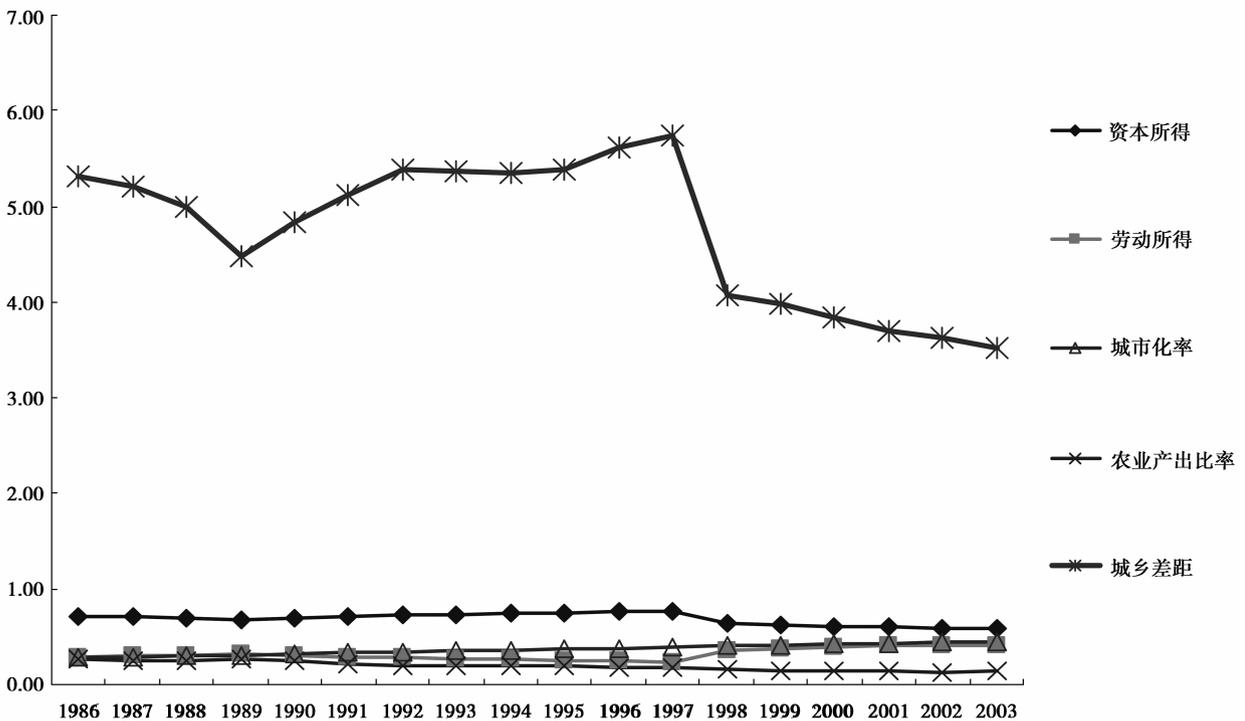


图2 资本所得份额的变动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四、结论

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城乡人均收入差距是相当大的(5 倍以上)。以 1983 年为例,当年全国人均手持现金 51.43 元,但典型的中国农村家庭往往为孩子 3~5 元的学费而发愁。我们注意到,珠三角地区的农民工月收入(工资及加班费)从 2003 年的 500~600 元增加到 2011 年的 3 000 元左右,增长近 5 倍。以农村典型的四口之家与城市典型的三口之家计算,假设城市劳均年收入 5 万元,农村劳均 2.4 万元^①,则我国 2011 年的城乡典型家庭人均收入比也只有 2.78。由于现行的地方统计未能将外出劳动力的收入有效地纳入农村收入范围,导致国家统计的城乡收入差距存在较大的误差。事实上,中国农村来自城镇的劳动收入,已经从上世纪 90 年代初期的 3 500 亿元增长到 2011 年的 4.5~5.0 万亿元左右。由于我们的模型将这种差异考虑在内,从而与国家统计有关城乡收入差距数据有较大的区别。

与一般研究结论不同,我们认为,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乡人均收入差距的变动趋势是逐步缩小而非扩大,城乡收入差距问题也并非人们所想象的那么严重。但是,不可否认,就城乡人均收入差距的绝对值而言,其持续增加的趋势并无争议。我们认为,作为一个越来越完备的市场经济体,中国城乡之间的人均收入差距已经开始从严重的不平等迈向相对均等。我们应更多地关注城镇和乡村贫困人群,关注农民工群体在城镇的医

疗、社会保障和农民工子女在城镇的教育问题,这比纯粹担心城乡收入差距扩大更有必要和更具现实意义^②。

参考文献:

- 蔡昉. 2005. 为什么劳动力流动没有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J]. 理论前沿, 20:18-20.
- 戴维·罗默. 2004. 高级宏观经济学[M]. 2 版. 王根蓓. 译. 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36, 87-136.
- 林毅夫, 刘培林. 2003. 中国的经济发展战略与地区收入差距 [J]. 经济研究(3):19-25.
- 陆铭, 陈钊. 2004. 城市化、城市倾向的经济政策与城乡收入差距[J]. 经济研究, 2004(6):50-58.
- 王小鲁, 樊纲. 2004. 中国地区差距的变动趋势和影响因素 [J]. 经济研究(1):33-44.
- 王小鲁, 樊纲. 2005. 中国收入差距的走势和影响因素分析 [J]. 经济研究(10):24-36.
- 姚枝仲, 周素芳. 2003. 劳动力流动与地区差距[J]. 世界经济(4):35-44.
- JOHN W, SHUNMING Z. 2004. Inequality Change in China and (Hukou) Labor Mobility Restrictions [R]. NBER Working Paper, No. 10683, 2004, 28.
- TAYLOR, WILLIAMSON J G. 1997. Convergence in the Age of Mass Migration [J]. European Review of Economic History (2): 27-63. (See also “Globalization, Convergence and History” and “Around the European Periphery 1870-1913.”)

(编辑:夏冬;校对:段文娟)

① 中国农村 70% 的劳动力外出打工,典型的农村家庭年劳动收入 4~5 万元。

② 除非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否则市场的作用必然导致城乡劳动力要素价格均等。